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服饰中华

(精编本)

黄陈娟娟能福
编著

中华服饰七千年

CHINESE COSTUMES:
SEVEN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OSTUMES

ABRIDGED EDI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



服饰中华

(精编本)

编著

黄能娟
陈娟娟
钢福

中华服饰七千年

CHINESE COSTUMES:
SEVEN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OSTUMES

ABRIDGED EDI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中华服饰源于旧石器时代，在7000年前，已经发明丝、麻等纺织物缝制的衣冠鞋靴等配套的服饰和用骨、角、贝、玉、陶等材料制造的美化生活的装饰品。中华祖先在新石器时代创造的丰盛华美的原始服饰文化，举世独步。夏商周时期，中华服饰进入以“礼”为规制的发展阶段，服饰意识与天地同构，内涵深邃。汉代以后，以儒学为理念的服饰制度，使服饰品类和材质工艺不断发展提高。数千年来，华夏服饰不断受到少数民族和域外异质服饰文化的滋养，使中华服饰不断创新和丰富，形成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服饰传统，为世人所称羡。

本书为《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四卷本）之精编本。根据以物证史的理念，按历史顺序，以最简明易懂的文字与服饰实际文物的图片相对照，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自原始社会至今的服饰发展，着重介绍服装形式、服饰制度、服装面料、服饰纹样、首饰佩饰的具体面貌。特别着重考古科学的成果与历史文献相印证，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全书正文及图文说明文字翔实，附图精美，各图均有详细图文说明。适合作为高等院校专业教学教材，以及作为戏剧影视界服装设计、服装装饰界创新设计、美术工作者专业创作和艺术品收藏者鉴别真伪的优良读物，为迄今出版的中国服饰艺术史类书籍中内容最全面、图片最丰富、编排最科学，具有历史研究价值、艺术鉴赏价值、收藏价值且兼具普及价值的学术巨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精编本 / 黄能福，陈娟娟，黄钢编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302-31762-3

I . ①服… II . ①黄… ②陈… ③黄… III . ①服饰—文化—中国 IV . ①TS94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7830号

责任编辑：王佳爽

装帧设计：王红卫 吕淳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235mm×305mm 印 张：36 字 数：1163千字

版 次：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480.00元

产品编号：052299-01

《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编委会

图书策划：宗俊峰

主 编：黄能福

副 主 编：(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宝林 李当岐 黄 钢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国和 王贵林 牛 晰 庄国华 李大钧
李之檀 李文瑛 李文儒 李德仲 杨 玲
杨 源 杨传箭 沈 惠 张润香 张雪杨
张道一 陈丽华 季 元 赵 丰 钟秉章
钱小萍 谭 安 薛 雁

中華織繡珍品

趙様初題



赵朴初：中国佛学会原会长 著名书法家

中華開泰

天地人復元亨

张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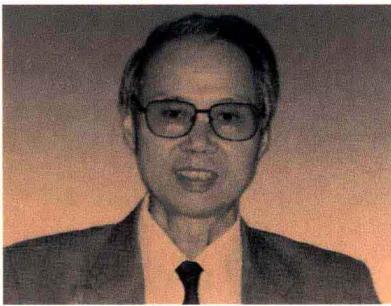


张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原院长著名书画家



CHINESE COSTUMES:
SEVEN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OSTUMES





黄能福简历

黄能福

一、简历

黄能福，原名黄能馥，男，汉族，浙江省义乌市人，1927年出生。1942年义乌县立初中肄业后在家务农，1949年被母校聘为语文教员。1950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1953年因院系调整转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当年本科毕业留校读研究生，并任工艺美术研究室秘书，全国第一届民间美术展览会会场管理组副组长、少数民族馆馆长。1955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61年兼任文化部高等艺术院校统一教材编选组员兼秘书。1982年起历任中国流行色协会学术顾问、专家委员会委员。1983年任国家科委、科技馆赴加拿大“中国古代传统科技展览会”纺织科技顾问。1987年任中国丝绸博物馆筹建处总顾问。1988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退休，同年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副校长兼实用美术部主任。1992年任纺织工业部服饰博物馆总顾问。1994年任北京现代实用美术学院名誉院长。1961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1981年加入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并任中国工艺美术馆顾问，中国云锦协会顾问。2008年10月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奖。2009年5月受聘为苏州大学兼职教授。2010年任新版50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服装顾问。

二、著作年表

- 1962年
编著《中国印染史话》，由中华书局出版，印数50500册。
- 1963年
编写《中国染织纹样简史》（与李绵璐合编），为高等艺术院校统一教材，1964年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
编著《丝绸史话》（与陈娟娟合著），由中华书局出版；“文革”后于1980年10月再版，印数65150册；1983年10月编入《经济专题史话》，印数13000册；1984年获“优秀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奖”。
- 1980年
参加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刊《装饰》杂志复刊工作，并任编辑。并主编《工艺美术论丛》。
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当代中国的工艺美术》、《北京风物志》等书的编写工作。
- 1982年
受聘任《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印染织绣》上、下集主编，两书于1985年12月和1987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继出英文版和日文版。《中国美术全集》60集出齐后，于1991年在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评比中获“特别金奖”；1993年又在首届国家图书奖评比中获“最高荣誉奖”。
- 1983年
与常任侠等五人应日中友好协会邀请合著《中国美术史谈义》，黄能福执笔《中国青铜器》。该书由日方译为日文，于同年6月由日本淡交社在日本京都出版。
撰写论文《谈龙说凤》，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头版第一篇。阐明龙凤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中早期，至阶级社会分化为宫廷文化与民俗文化，今天龙凤已不再是代表皇权的标记，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凝结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审美趣味，是非常宝贵的民族传统文化遗产。
- 1984年
编著《龙凤图案》，由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
编著《中国动物图案》，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 1986年
编著《历代动物纹样》，由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
- 1987年
编著《中国龙纹图集》（与陈娟娟合著），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和香港万里书店联合在香港出版，1997年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制成光盘；1988年由台湾南天出版社专版在台北出版。
任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辞典》编委，主编《基础图案》、《染织》、《服装》卷。该书于1988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1988年
撰写论文《龙年说龙》，发表于中国对外文化协会主办的以16种文字向世界发行的《文化交流》杂志，总第一期头版第一篇。

1991 年

编著《图案造型基础》(与黄钢合著),由神州出版社出版。

1992 年

编著《色彩学基础》,由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编辑成册。

1993 年

撰写论文《中华龙文化综述》,为《中国龙文化景观》一书代序,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4 年

编著《中华服饰艺术源流》(与陈娟娟合著),胡乔木先生为此书题写书名并写信致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编著《中国服装史》(与陈娟娟合著),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997年1月在全国第二届服装书刊展评会上获最佳书刊奖。

1995 年

编著《中国历代装饰纹样大典》(与陈娟娟合编),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8 年

编著《中国服饰史》(与陈娟娟、钟漫天合著),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编著《中华文化通志·服饰志》(与陈娟娟合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化通志》一百志于1999年出齐后,获全国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1999 年

编著《中国历代装饰纹样》(与陈娟娟合编),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2002年获清华大学优秀教材奖。

编著《中华历代服饰艺术》(与陈娟娟合著),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于2000年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2000 年

编著《中国传统艺术·龙纹装饰》(与陈娟娟合著),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合编《中国艺术百科辞典》,冯其庸先生任总主编,黄能福任副总主编及服饰卷主编,该书于20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002 年

编著《中外服装史》(与李当岐、臧迎春、孙琦编著),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

编著《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与陈娟娟合著),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于2003年获第十一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2003 年

主编《中国南京云锦》,由南京出版社出版,于2005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2004 年

编著《中国服饰史》(与陈娟娟合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6 年

编著《中国龙袍》(与陈娟娟合著),由紫禁城出版社与漓江出版社联合出版。

编著《中国成都蜀锦》,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2007 年

编著《中国服饰通史》,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获中国纺织总会2007年优秀图书奖。

9月主持研发复原三星堆商代蜀王青铜立像所穿的四件套龙纹礼衣,由北京京都丽人商贸有限公司绣制成功。

撰写论文《复原三星堆青铜立人龙纹礼衣的研发报告》,发表于《装饰》2008年1期。

撰写论文《中国龙文化》,载于《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论文集》,由山东美术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

2009 年

编著《衣冠天下——中国服装图史》(与乔巧玲合著),由中华书局出版。

2010 年

《金翠光华——中国首饰图史》(与苏婷婷合著),由中华书局出版。



陈娟娟简历

陈娟娟

女，北京人，汉族，1936年出生。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古代丝绸文物复制中心副主任。曾先后担任中国丝绸博物馆筹建处顾问、苏州丝绸文物复制中心副主任、中国丝绸文物研究复制学术顾问、中国服饰艺术博物馆筹建处顾问、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府刺绣顾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数字博物馆建设项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服饰研究会研究员。1956年进入北京故宫博物院，师从沈从文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织绣文物。四十余年，一直从事古代织绣文物的研究、分析、鉴定工作，为故宫及兄弟博物馆分析鉴定了数以万计的织绣文物。

主要学术著作见黄能福简历中的合著部分；此外还与他人合著《国宝》（1983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宝录》（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等，并在《文物》、《文物报》、《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等学术报刊发表专业论文四十余篇。2005年其专著《中国织绣服饰论集》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编入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2002年3月，被《中国文物报》评选为全国文博考古界百位学术成就显赫、治学经验丰富、极具创新精神的专家学者之一。



黄钢简历

黄 钢

男，北京人，汉族，1961年出生。

著名织绣文物收藏家、画家。1984年中央美术学院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91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2000年个人作品在德国慕尼黑、柏林、汉堡、法兰克福联展，并在中国香港J画廊举办个人展。2001年在法国巴黎举办个人画展，在美国纽约、芝加哥参加亚洲艺术博览会和IN SEARCH OF画廊画展。2002年在美国纽约宝林画廊参加纽约博览会画展和上海艺术博览会画展。2003年在美国圣达菲组阁画廊举办个人作品展，在美国西雅图沃尔茨画廊参加亚洲现代艺术联展及美国芝加哥沃时画廊芝加哥艺术博览会画展。2004年参加美国匹兹堡艺术学院画廊中国艺术家联合巡展、韩国汉城国际博览会及北京国际画廊艺术博览会画展。2005年在美国圣达菲组阁画廊举办个人画展。2006年在中国台湾平画廊举办个人画展。2007年在法国巴黎JGM GALLERY参加“毛，当代视觉”画展，在北京A空间参加北京与纽约十位艺术家联展，在中国香港安娜宁画廊及新加坡坡林大画廊举办个人画展。2008年在中国台湾亚洲艺术中心举办“北京的记忆”个人作品展，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举办“远方的呼唤”个人作品展，并参加北京的“新东方精神”、“艺术史里外”、“流动的星”等联展。2009年参加由深圳美术馆、湖北美术馆举办的“历史的图像”展，参加由日本东京都美术馆主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

2006年编著《中国龙袍》（与黄能福合著），由紫禁城出版社与漓江出版社联合出版。

2008年11月由保利艺术博物馆、凯旋艺术空间编著《黄钢 HUANG GANG》大型画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序一

郑欣森

中华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又丰富多彩，素以“衣冠文物礼仪之邦”和“丝绸之国”闻名于世。黄能福、陈娟娟、黄钢合著的《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就引导我们领略这悠久的历史和万千的气象。

我们的祖先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磨制骨针缝制毛皮衣服，佩戴兽牙、贝壳、骨管、鸵鸟蛋壳、石珠等连串的串饰。到了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农耕牧畜，营造房屋，男子外出狩猎，打制石器，琢玉；女子从事采集，制陶，发明纺麻，养蚕制丝，纺织毛、麻、丝布，缝制衣服。根据考古材料，我国在距今7000年前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发现有100余件带有麻布或编制物的印痕，其中已有平纹、斜纹、罗式绞扭织法、绕环编织法等编织方法。江苏吴县草鞋山发现了距今5400年前的葛布，织有回纹和条纹暗花。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平纹蚕丝绢和浅绛色罗，距今已5500年。新疆和青海新石器文化遗址则发现过彩色花纹的织锦和在绢帛上绣出精美花纹的刺绣。衣冠鞋履、玉石首饰、佩饰与华美的发型配套，构成中华上古服饰文化的繁荣景象。

服饰是人类源于护体御寒等生理需求的物质的产品，又是反映人们审美观念和生活理念的精神载体。我们的祖先自从发明了纺麻、缫丝、织毛等手工技术，就能利用纺织品缝制适合护体御寒的配套服装，而且创造了形式美观、具有思想内涵的服饰纹样，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末，中国进入传说中“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时代；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统治者以“天命

神权”为精神支柱，宣扬“道协人天”的思想，把森严的等级制度以“礼”的形式固定下来。服饰是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就成为“礼”的重要内容，作为“分贵贱、别等威”的工具。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他与天帝沟通的办法即祭祀。《礼记·祭法》：“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论语》中说，禹平时生活节俭，但祭祀时必穿华美的礼服——冕，以表对天帝的恭敬。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继承和变革发展，到周代就形成了以“天子”为中心的完善的服饰制度，按礼节的轻重规定穿不同的礼服，同时规定按不同的政治地位穿不同的礼服，位高者可以穿低于规定的礼服，位低者越位穿高于规定的礼服则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后宫妃嫔及百官的服饰也都有相应的定制。这些服制的思想内涵，完全从属于传扬“天命神权”，巩固阶级统治的政治需要。例如天子冕冠的綯板前圆后方，前面象征天，后面象征地；前后垂旒各十二条及天子章服的十二纹章，象征月之四时运行的十二地支（月令），冕旒以五彩缥（丝绳）贯朱、白、苍、黄、玄五彩玉珠，这五色与季节、气象、方位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星座相对应。天子章服的十二章纹，更具政治伦理的内涵，作为王权的标志，历代传承以至清末。

从考古证知，人类使用首饰佩饰早于使用服装。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如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制作的玉器，包括发饰、冠饰、耳饰（玉玦及耳坠）、颈饰（玉串饰及玉项链）、臂饰（玉瑗、玉臂环、玉镯）、手饰（玉指环）、佩饰（玉璧、双联璧、三联璧，及鸟、兽、蛙、



鳖、龟、龙等象生型玉佩）、玉带钩等，其形式之多样，磨琢之精巧，令人叹止。商周时期，玉器被统治者作为人格道德的象征，所谓“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除玉饰之外，商代已生产金首饰，以后金银珠玉宝石镶嵌工艺技术高度发展，首饰的艺术形式与文化内涵不断丰富，一器一物，往往价值连城，这就形成中华传统工艺美术的光辉府库。

在中国古代服饰纹样中，龙纹是地位非常显赫的装饰题材。古代神话中，如黄帝、女娲、伏羲等都说是人头蛇身的神人，《虞书·益稷》把龙作为天子冕服十二章纹中的一章，而龙蛇作为服饰纹样的实例，已见于甘肃临洮出土的彩陶人形器盖中。《诗·小雅·采菽》中说：“又何予之，玄袞及黼。”商周铜器铭文，亦可发现赐玄袞衣的铭文。玄袞衣即绣有龙纹的玄衣，可见中国统治阶级首领穿用龙衣由来已久。历朝以龙纹为衣袍装饰的实物形象，留传至今的甚少，唯明清两代尚有流传，尤以故宫博物院收藏最为系统、完整。当年龙袍纹饰款式系由清宫如意馆画师按服饰制度精心描绘，经审准后核发江南织造府织造，材质夏用纱、绣、缂、丝等，冬用织成妆花缎或以缎、绸绣制，表以紫貂、薰貂、海龙皮等，织绣工艺精工无比，绣线则采用扁金线、圆金线、龙抱柱线、孔雀羽线等。一袍之作，辄逾一二年，积民间工匠心血智慧之精华。

中国自古是多民族聚居的国家，服饰文化以华夏农耕士儒文化为主体，不断与少数民族的游牧骑射文化相交融，并在交融中发展。华夏民族注重礼仪德化，故服饰雍容宽博，

气度万千，但实用功能性差。游牧民族活动性大，生活无定处，故注重穿脱方便，合体实用。当少数民族入据中原华夷共处之时，华夏贵族的服饰便对少数民族贵族起到感染，如北魏孝文帝的服饰改制即其实例，而少数民族的实用功能性服装则对华夏军队与劳动者产生重大影响，如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及以后短装在民间日益普及，提示了服装向科学实用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独树一帜，值得我们去研究、弘扬。

黄能福教授和陈娟娟研究员，从20世纪50年代初即随前辈服饰史学大家沈从文先生研究中国服饰艺术史，历近半个世纪，学术成果颇丰。他们夫妇二人的合著，曾荣获两次中国图书奖、一次国家图书奖、两次国家图书奖荣誉奖。陈娟娟自幼多病，曾患多种高危疾病达数十年，但一直坚持在故宫从事织绣文物的陈列、研究，与其爱人黄能福合作，矻矻于学术著述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陈娟娟是故宫博物院培养的一名优秀的织绣文物专家。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不久，曾去医院看望过病危中的她，还想待她出院后再细谈，不料竟成了永别。现在，由她和黄能福、黄钢合著的《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在故宫博物院庆祝建院八十六周年之际出版，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好事，既是陈娟娟、黄能福、黄钢对祖国服饰文化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是故宫博物院对祖国文博事业的一份贡献。

（郑欣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

序二

冯其庸

黄能福教授、陈娟娟研究馆员和黄钢的专著《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快要出版了，他们要我为此书作序，我于此道实属外行，因此也只能说些外行话。

我国素称“衣冠文物”之邦，这“衣冠文物”大概就相当于“文明”、“文化”之类的意思。于此可见，“衣冠”也就是“服饰”，确实就是“文明”或“文化”的象征。

考我国的原始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早在距今4000年到8000年的时期内，我国境内不论东西南北，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发生了，这许多原始文化，有不少是自生的而不是由一处向四周传播的。但是伟大而丰富复杂的中华文化，并非仅仅是这许多原始的自生的文化，而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由这许多原始文化交融发展而成的。在交融发展的过程中，又有一种作为主体的文化在起着主导的作用，这种主体的文化，也就是华夏的文化或中原的文化。研究我国的原始文化或早期文化，这多元论、交融论和主体论是紧密联系的，三者缺一不可。仅仅承认其中之一或之二，都是不全面的。

服饰是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我国的服饰史，有着与原始文化同样长的历史，如果从周口店山顶洞人制造的骨针算起，则已经有2.5万年的历史了，它远远超过了以新石器时期计算的原始文化的历史。由此看来，中国的服饰史，也应该是多元的、交融的和有主体的。

服饰是文明和文化的象征，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能直立，能劳动，能进行高级的思维，能用语言交流。服饰就是高级思维的成果。服饰的发展，也反映了人的思维的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审美观念的发展。

从服饰，可以区别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古人对民族服饰的区别是十分重视的。孔子曾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就是说，改变服饰，当亡国奴是绝不容许的。所以明末清兵入关，下雍发令，易服，造成了汉人的奋死反抗。

从服饰，也可以区别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等级。大家知道，在封建时代，从皇帝、文武百官，到庶民，到刑徒（罪人），在服饰上是有严格区别的，丝毫也不能混淆。

从服饰，也可以反映我国纺织业的发展，皮裘业的发展，印染业的发展。

我们看到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4700年前的丝织物，不能不感到我们服饰文化的源远流长。我们看到各地博物馆所藏的汉唐织物，尤其是看到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年的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轻如烟雾，衣长128厘米，两袖通长190厘米，领边、袖边还镶有5.6厘米宽的夹层绢缘，但全部重量只有48克，不足一两（50克），不能不为之惊叹。我们在敦煌莫高窟见到的北魏和唐代的塑像，其服饰之华丽名贵，简直莫可名状，虽然是绘画，并不是实物，但这必然是依据服饰实物描绘的，绝非虚构。

从服饰，也可以看到我国工艺美术的发展。从上举这些例证，尤其是现存各地博物馆的各个时期的服饰和织物，可以充分证明，我国的服饰文化，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

所以一部服饰史，也就是一部中华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常说，历史是圆柱形的，不是平面的。那么，服饰史，也就是圆柱形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常说，无论是学文学还是学历史的，不能光学空洞的理论。理论是重要的，但要与实际结合，涉及具体事物，则要与具体事物结合。汉诗《陌上桑》描写罗敷的服饰：“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如果结合服饰史与出土文物对照来看，那么这许多描写就立体化了，读者所得的概念就不是平面化的了。同样，杜甫的《丽人行》说：“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黛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隐称身。”这许多描写，如果能与唐画、唐墓的壁画以及出土文物来对照，所得的结果，自然也就不会停留在概念化上了。

前些年，我在作校注《红楼梦》的工作，在第三回凤姐出场时，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写：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

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这一段描写，光是服饰和佩戴，就有八种，如果将这样一个角色搬上舞台或荧幕，就必须首先解决角色的全身服饰，而我们在注释过程中，就是调查了不少博物馆，参考了不少实物才得以初步解决的。

由此看来，一部服饰史，却牵动着整个文化史或者说整个历史。也因此，一部服饰史的作用，何止于服饰，它实在是读文化史、文学史、历史等所不可缺少的。

昔年，沈从文老先生索居斗室，撰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我曾去拜访过他，丈室之中，只能放一张双层床（上层放书，下层睡觉），一张二屉桌，此外就再无宽绰之地了，但沈老终于完成了此皇皇巨著，为中国服饰研究树立了丰碑和典范。以至于今天我们谈到服饰研究，就自然而然地会怀念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

但是，历史是发展的，学术也是发展的，从那时以来，我国的考古发掘，又有了许多进展，何况已出土的文物，也难于以个人之力去穷尽究索，故近年来服饰研究之作，续有所出，足证这一学术领域的蓬勃气象。

黄能福及其已故夫人陈娟娟两位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丝绸织绣、文物考古专家，工艺美术专家，他们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印染织绣》上、下集，早已驰誉国内外，他们有关这一领域的其他专门论著，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和《中国服装史》、《中国服饰志》等，也久为学术界所珍视。现在这部《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则更是他们的皇皇巨著。他们根据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按照人类演化的历程，以大量具体的考古材料与中国原始神话相对照，探讨了中国原始服饰艺术的起源及演变，把中华原始服饰的研究推向深入。

服饰文化具有精神和物质两重属性，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观念给予服饰艺术以内容的制约和形式的规范，时代的物质生产和科技发展给服饰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依据，而多元文化的交往和相互融汇，是繁荣发展民族服饰文化的重要条件。《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抓住以上脉络，按照时代顺序，分章论述我国各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并参照历史文献和考古实物图文并茂地介绍章服制度、服装面料、印染织绣科技、纹样色彩、服装款式、首饰佩饰的基本面貌，从而揭示中华服饰艺术的光辉成就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了照顾可读性和兴趣性，他们还尽量采用白话文配合图片，做到既通俗易懂，又有学术深度。这是与他们数十年从事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印染织绣美术设计及史论、中国古代织绣文物鉴定、中国服饰、艺术史研究的实践，掌握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形象资料，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修养分不开的。就形象资料而言，本书已经包容了目前国内出土和收藏的各个历史时代有关服饰艺术文物资料的精华，内容之系统广泛，包容量之丰富，也可说是空前的。我相信，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学术著作，它的问世，必将对我国的服饰史、服饰艺术研究，乃至服饰文化的研究，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我个人读书，一向喜欢旁搜远钻，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学一句现在时髦的话，叫做多角度、全方位地看问题。其实苏东坡早就提出了“八面受敌法”，也就是从多角度去“攻书”（古人称读书叫“攻书”），从书的一面说，就要多角度地受攻。现在有此一部渊深而又晓畅的服饰艺术史专著，对我来说，无疑是增加了一个读书的角度，多了一个凭借，我自然欣喜无量，我自然也为天下的读者欣喜无量。承蒙本书著者要我写序，我就把我的这一点私心窃喜和盘托出，公之于世。至于其中谬误，我自然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教正。

（冯其庸：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原院长，红楼梦学会会长，书画家，研究员，著名学者，现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

绪 言

中华服饰文化是在世界服饰史上具有悠久的历史，汇聚了多民族智慧的文化精华。继承中华优秀的服饰传统，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饰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约在40万年以前知道利用兽皮来抵御冬天的寒冷。到距今10万年至5万年的尼安德特人时期，人类已经能够缝制毛皮。在距今4万年至1万年的克罗马农人时期，皮衣已进入发达阶段。这一演进的历史过程大体和中国服饰的起源演进过程相近。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北京人已经具备利用兽皮保暖的能力。至更新世晚期智人阶段，辽宁营口金牛山人已能制造磨尖了的骨锥在兽皮上钻孔，以皮条皮筋穿过兽皮的孔眼制成原始的兽皮衣服；金牛山人还用钻孔的骨板制作佩饰品，在辽宁海城小孤山距今4.5万年的遗址就出土了几枚相当精致的骨针和穿孔的兽牙蚌骨等。河北阳原虎头梁出土的穿孔贝壳、钻孔石珠、鸵鸟蛋壳和鸟骨制作的扁珠，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所使用的原始佩饰品，有些扁珠的内孔和外缘相当光滑，说明曾长期佩戴过。北京房山山顶洞人遗址距今1.8万年至2.5万年，这里发现了穿孔的兽牙125枚，有5枚穿孔的兽牙是排列成半圆形的，显然是原来的串饰；还有7颗散布在头骨附近的小石珠的穿孔曾用赤铁矿研磨的红色粉末涂染过。虽然这里出土的骨针比辽宁海城小孤山旧石器遗址发现的骨针粗糙一些，但考古学家发现这里埋葬的尸体周围撒有赤铁矿的红色粉末，表明当时曾举行某种葬礼，从用红色粉末施撒尸体周围等现象分析，可知我国早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即已有与原始巫术观念相融合的原始服饰文化。至新石器时期早期，丝、麻、葛、毛等手工纺织和绘画工艺出现，衣冠鞋靴已与玉石首饰佩饰、发型配套。在辛店文化的装饰陶器中，还出现了以龙纹为装饰主题的服饰的陶塑人形，把中国龙袍的历史推前到距今5000多年。这些都是古代典籍所从未提到的。中国服饰文化的历史，从发明手工纺织品制作成套的服饰起算，上下7000年，史料记载与出土文物的丰富与完整，世所罕见。

服饰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随着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的提高，逐渐创造了服饰和服饰文化。服饰包括服装和首饰佩饰及配饰。它们既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创造的物质条件，又是人们在社会性活动中的重要精神表现。人们对服装的要求有生理方面的物质性和心理方面的精神性。物质性表现为

衣物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即衣服保暖、透气、散热、防护肌体、便于活动等物理、化学性能；精神性表现为审美的艺术性和象征性。服饰的精神性是流动的，在发展过程中常因环境和社会的变化而出现流行性变化，产生空间性位置移动和传播，以及时间性的传承和革新。而人的审美意念和象征意念不仅受时代意念的制约，而且受民族意念的制约。这是服饰文化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原因。服饰的品种款式的变化是服饰的外形，受民族审美意念和象征意念主导的文化气质和艺术气质，才是服饰内在的神采。

本书以中国服饰文化的起源、形成、繁荣、发展、演变全过程的物质性特点和精神性特点为对象，记述各个历史时期服饰文化的发展演变，其中涉及服饰门类、穿着方式、服饰制度、服饰材料、服饰纹样、发式打扮诸方面。服饰是多源的文化，各民族的服饰文化在发展的道路上互相交融，都以本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从中华服饰文化发展的长河，找出演变的客观规律，对于弘扬中华服饰文化传统的优势，创造符合当代科技和艺术时尚的社会主义新服饰文化，树立中华服饰文化的新形象，应是必由之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中国服饰文化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一直举足不前，这是由于服饰文化不能单以史书为研究的依据，而必须广泛研究考古发掘的实物，并与历代遗存的雕塑、绘画等形象资料相佐证，以物证史，才能窥见古代服饰文化的真实面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发掘工作在全国普遍展开，湖北江陵马山砖厂1号战国楚墓，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福建福州北郊浮仓山南宋黄昇墓，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山东邹县元代李裕庵墓，北京定陵明万历皇帝及孝端、孝靖皇后墓，以及新疆民丰北大沙漠、吐鲁番阿斯塔那、楼兰等古代“丝绸之路”沿线，都先后出土了保存完整、品类众多、纹彩鲜丽的服饰、丝绸、刺绣实物；陕西临潼秦始皇陵秦俑坑、陝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西安唐懿德太子李贤墓等一批古代王族墓葬的壁画、雕塑和敦煌莫高窟等古代佛教洞窟的壁画供养人像等，展示了当时人着装形象的风采，使我们能通过这些考古发掘资料，结合文字史料了解古人衣着生活的文化内涵，为深入开展中华服饰文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条件。

党和政府对中国服饰文化的科学研究极为重视，1954年周恩来总理就提出建立中国丝绸博物馆和中国服饰博物馆的设计。现中国丝绸博物馆已在杭州建成。1983年在制订中国服装

设计研究中心方案时，服饰博物馆就纳入了规划，馆址设在北京大北窑服装大楼内。1964年，周恩来总理嘱托沈从文编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学术巨著。沈从文为此投入了全部精力，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写成这部力作。沈从文以广博的学问和坚强的毅力，将浩瀚的文史材料及历代绘画雕塑作品和考古发现的有关服饰资料进行全面的排比鉴定，归纳分析，从而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结论，开拓了中国服饰文化史研究的正确道路。20世纪80年代有一大批反映中国考古工作重大收获和文物科研重大成果的大型图书陆续出版，如“中国博物馆丛书”、《中国美术全集》、《良渚文化玉器》、《殷墟玉器》、《秦始皇兵马俑》、《敦煌莫高窟》、《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定陵掇英》、《西夏文物》、《国宝》、《故宫赏宝录》、《清代宫廷生活》等。此一时期在台湾也有《故宫服饰展览图录》、《中国古代玉器图释》、《中华服饰图录》、《中华袍服织绣选粹》等书出版。这些都为中国服饰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可靠、印刷精良的图像。同时周锡保、那志良、孙机、周汛、高春明、王宇清、张道一等则从服饰文化的不同层面，发表了各自的重要学术著作，把中华服饰史的研究推向新阶段。

基于我国考古及文物、历史研究的巨大成就，20世纪90年代本书作者编著出版了《中华服饰艺术源流》和《中国服装史》两部著作，前者汇集从原始社会至20世纪初有关服饰艺术的彩色图版880余幅，后者以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服饰史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据，以服装学的一般原理为基点，系统介绍中华服饰文化的起源及历代的发展演变。从而弥补了前一阶段缺乏原始社会服饰研究的空白，并进一步使服饰文化的研究普及化。

服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起源远远早于阶级的产生，因此服装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服饰资源为统治阶级所占有，服饰文化也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史传夏代中国最高统治者就用“十二章”服饰纹样作为最高权威的象征。儒家学派对“十二章”作了很多解说，如“十二章”中的宗彝为“虎彝”、“雉彝”的说法，显然与夏代青铜器铸造的实际不符。但先秦时期统治阶级的礼服以龙纹为饰，则已被出土文物所证实。龙纹在原始社会作为一种超自然力的象征而受到原始人的崇拜，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辽宁海城发现一条8000年前用鹅卵石摆塑的长龙，横亘于原始聚落的住房与墓群之间，这条巨龙显然不是某一首领个人权势

的标志，而是原始聚落成员共同的保护神。甘肃宁定出土了一件穿着蛇纹衣服、文面、头上盘着一条长蛇的半山型人形陶器盖，中外学者认为这件人形陶器盖与龙图腾的崇拜有关，它所反映的可能是一位巫师，应该是一位能够驯蛇的巫师。而他所穿着的衣服，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龙衣形象，当是后来龙袍的前身；这件龙衣陶塑，反映了原始服装与原始宗教观念之间的关系。目前见到的真正能够称为龙袍的形象是河南安阳出土的几件商代玉雕人形和著名的乳虎首中的人形，这些人形的服饰纹样，都是在两袖饰降龙纹，两腿饰升龙纹，前胸饰龙头形铺首纹，后背及领缘饰黻纹，花纹的整体布局大体与后代的龙袍相当。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商代巨型铜人立像，头戴王冠，身穿龙纹礼衣，龙纹作对称式适合于矩形框架之内，共为两组，排列于衣襟左侧，左肩后侧有一螭龙纹为饰，整件衣袍装饰极为华丽，似为蜀王的形象。如果半山时期的巫师所穿的龙衣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服饰文化上的反映，那么到了商代，商王族和蜀王所穿的龙纹礼衣，就已经转化为神权与王权的综合象征，成为国王和王族政治身份和特权的标志。

服装有物质的实用功能和精神的装身功能。在原始社会，服装的装身功能主要体现为表现原始的宗教意念。到商周时期，由于阶级的分化和对立，为了强化精神统治，把服装作为“分贵贱，别等威”的工具，根据阶级等级规定了相应的章服制度，从而强化了服装的上层建筑性质，我国夏、商两代奴隶主贵族即已穿冕服举行政治性的活动与祭礼。根据《周礼·春官》记载：“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袞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绎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合称六冕。周代王后则有袆衣、揄翟、阙翟、鞠衣、展衣、祫衣等六种礼服与国王的六冕相配衬，以此为主体形成了奴隶社会象征政治等级体制的冠服制度。中国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对于周礼是十分赞赏的，儒家经典对周代的礼治精神和冠服制度又不断进行了理论上的发挥，把服装的审美意念和象征意念与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及神学观念融为一体，形成了中华以人伦和天命为依归，制物尚德，法天则地，仁民爱物，立足于礼治和德化精神内涵的中华服饰文化传统，传承于世数千年。

服装的款式造型设计，与服装的材料有着直接的联系。中

国古代以褒博衣冠为特色，与中国自古就是“丝绸之国”有关，以光艳柔软的丝绸制作衣裳，采用宽松脱体的款式造型，便可创造豪华高贵的艺术气氛。当中国丝绸通过“丝绸之路”远销到罗马帝国时，罗马帝国的贵族便爱如珍宝，不惜以与黄金等价的高昂价格买中国丝绸。恺撒大帝不顾大臣们的非议，穿着中国丝绸的袍子去看戏。随着中国丝绸的出现，罗马王公贵族，无不争穿宽松长大的绸袍，妇女则争穿曳地丝绸长裙，习为风尚。为了支付购买丝绸的巨额用款，罗马帝国甚至国库空虚。中国式的褒博衣冠也风靡东亚诸国。以中华传统服饰为代表的东方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的宝库中独树一帜。中国古代的妇女服装通过丝绸的质感和装饰配饰件如巾的披挂、带的飘忽、袖的舒展、裙的松放所展现的柔丽风姿，与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文学、诗歌及中华儿女外柔内刚的天赋性格相谐和，构成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显明格调。

中国丝绸服装拥有数千年传统技艺的积累，拥有举世无比的技艺优势。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战国楚墓和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丝绸衣物，丝绸品种丰富，织绣印染技艺多样，纹彩绚丽夺目，展现了我国两千年前服饰艺术的风彩。以上两座墓葬的墓主人在当时爵位不高，随葬衣物大概还不能代表当时服饰技艺的最高成就，因此袍服所用面料，除印花敷彩及刺绣为单独加工外，纹饰多与被褥、囊、垫等的用料相同。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重不到一市两（50克），足以反映当时缫丝、织造技术的精湛。据南北朝文献记载，当时的高级服装已根据衣物的款式规格，按裁片对位设计花纹，织为匹料，文献上称为“织成”。《北史·吐谷浑传》记有织成裙被、锦大袍，《南齐书·东昏侯纪》记有织成袴褶，《晋书·石季龙传》记有金线织成合欢裤等名称，以及唐代文献所记的番客袍锦等，都是古时的“织成”。这类“织成”在内蒙古辽代耶律羽之墓已有实物出土，衣料为独幅唐草瑞鸟瑞兽纹，花回长达1.6米以上，气魄宏大。元代宗室所穿织成缠身大龙袍，当时民间也能织造，并在市上出卖，元世祖发现后下令禁止民间织造和买卖。明清时期，宫廷所用袍服除刺绣、缂丝者外，凡木机织造的均为织成料。北京定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大红妆花纱织金孔雀羽过肩龙通袖龙襕袍及大红妆花缎孔雀羽柿蒂龙袍等珍贵文物，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保藏的大量明清时期皇帝及皇后们所穿的朝服、吉服，都是工艺技术无比高超、材料极其珍贵的“织成”服装。

利用鸟羽捻线织绣衣袍，其色泽鲜丽而有闪光的变化，与金银线及各色丝线组合，其富丽豪华无与伦比。但鸟羽的拉力不强，以鸟羽捻线需以丝线作线芯，再将鸟羽一根接一根地用另一根丝线捆绑到线芯上而成，工艺细致而繁复。我国南北朝时已利用各种鸟羽作成帽子，名“白接篱”。《晋书·武帝纪》记载有雉头裘、鹤氅、白鹭攘等服装及《南齐书·东昏侯纪》所载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织孔雀毛为裘，光彩金翠，过于雉头矣”。北京故宫博物院保藏的一件清乾隆时期的孔雀羽缉米珠刺绣吉服袍，袍身全部用孔雀羽线钉绣，上用各色彩绒线及金线绣八吉祥和云纹，主装饰龙纹用缉米珠、红珊瑚珠及青色龙抱柱线绣成，金翠夺目，极尽豪华富丽。《红楼梦》中所记的孔雀金裘及凫靥裘，是中国传统服饰技艺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羽毛也用来作冠饰及羽扇。周代有“钟氏”这种官吏，专门管理羽毛染色的工艺。

裘皮服装的加工是我国古老的传统工艺，先秦时期统治阶级对裘皮服装的搭配就很讲究，要根据不同的礼仪场合选配不同颜色和质地的裘服。以后，封建贵族选用紫貂、薰貂、银鼠、海龙、白狐、玄狐、猞猁等珍贵裘皮为冬季服装，平民百姓则穿用羔皮、羊皮等过冬。

自从元代棉花在中国普遍种植，棉布就成为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主要服装用料。劳动者服饰简朴，纹饰以手工印染、十字挑花、贴补花及刺绣编织等民间传统工艺加工为主，文化气质淳厚，与统治阶级的冠服形成对照。明清时期民间流行的吉祥图案，也常常渗透到宫廷生活中，增加了宫廷服饰的情趣。

中国社会历经4500余年的阶级统治，服饰文化向两极化发展，统治者的服饰制度越来越强调统治者精神意念的功利性，从而破坏了服装的基本功能的平衡。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数千年以来的封建冠服制度从此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中国服饰从此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中山服为代表的短装成为时代服装款式的主流。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人民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国家不断富强，具有悠久历史和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一定会在人类历史上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服装的艺术形象，很难用文字作很具体的描述，而通过图像则能一目了然，沈从文先生在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